

全面抗战初期粤港社会在难民应对中的互动与协作*

——以宝安与香港为中心

罗文捷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1937至1940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华东、华中大片国土落入日寇之手,华南亦遭受日军的持续侵袭。为躲避战乱,大批内地民众南下粤港地区,并随着广州和宝安县的沦陷而形成了大规模、多波次的区域聚合和过境香港的“难民潮”,继而在宝安和香港两地社会引发出区域性难民救济问题。宝安和香港两地社会既独立施救、又互动协作,通过加强收容安置、发动社会帮扶、筹放赈济物资、组织回迁流转以及鼓励、帮助垦殖自救等措施,对难民进行了积极的救济,实现了区域间难民救济活动的有效接续与延展,也展现了两地政府、各界社会组织在难民应对与救济工作中的多元主体角色和丰富实践面相。但是,随着日军在后续时期数度进占宝安、武力封锁边境和迫近压制香港,两地的难民救济工作渐显被动、乏力,难民终难获得安宁的生存环境。对全面抗战初期粤港(主要是宝安县和香港)区域性难民救济实践的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和认识抗战时期内地与香港社会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互动历程,并为新时代加强域内城市协作、应对潜在的危机挑战和促进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提供启发。

[关键词]全面抗战初期 难民救济 区域性难民问题 宝安与香港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K269.5; 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4-0045-12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民众被迫南下,前往相对安全的粤港地区。1938年10月,随着日军攻占广州及其邻近城市,粤港边界的宝安县^①出现难民大规模进入香港的情况。同年11月下旬,宝安县亦为日军所占领,数万民众涌入香港避难。此后,宝安县一直处于中日争夺之中,不少民众亦在宝安县与香港两地(以下简称“县港两地”)之间往返流转。跨境难民的救济工作,成为一段时期内县港两地持续面对的社会问题。

面对难民的聚合与流转,县港两地社会既独立施救、又互动协作,对域内难民给予了积极的救济,体现了内地和香港人民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展示了两地社会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民族力量。

抗战时期的难民及其救济问题长期为学界所关注^[1-6],研究成果丰硕,相对集中于南京大屠杀后的难民救济与难民权益、难民情感等问题上^[7-10]。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内地难民在港的整体境况及港方态度^[11-14],对宝安与香港两地

收稿日期:2025-09-23;修回日期:2025-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粤港澳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VMZ007)

作者简介:罗文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香港史、深港关系史研究。

①宝安县为现深圳市前身,1914年由新安县改名为宝安县,1979年改为深圳市。本文正文所谈及之“宝安”,皆指1914至1949年间的宝安县;正文所谈及之“深圳”,皆指1931年后的宝安县深圳镇;结语中的“深圳”,为现深圳市。

在难民救济中的互动协作情况缺少深入探究。本文拟在分析1937—1940年粤港区域性难民问题形成发展的基础上,梳理县港两地难民救济的实施情况,呈现两地社会围绕难民救济开展的互动协作,以期对当今加强区域城市发展协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及促进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启发。

一、全面抗战初期粤港区域性难民问题的形成

1937—1940年间粤港地区出现的区域性难民问题,缘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又因广州和宝安县的先后沦陷而日趋严重,导致大批难民经宝安涌入香港,给县港两地的救济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1937年下半年,上海、南京相继为日军所占。由于日军尚未对广东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粤港地区仍处相对安全的区位,由此成为内地民众逃难的目的地。“有些人又从上海起程,再向华南移动,或是到香港或是到广州”^{[15](P91)}。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利用其海空作战优势,对广东城乡持续实施海上封锁和空袭,造成省内难民大批南下香港。1937年8月31日起,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广州。至1938年6月,日机空袭广州达800架次,投弹超1万枚^{[16](P263)}。在空袭广州的同时,日军也对宝安实施了轰炸。^①1937年9月,两艘日舰抵达赤湾,配合日本陆、空军对宝安进行炮击。^[17]1938年3至5月,日军多次轰炸宝安县,导致多人伤亡,房屋、商铺严重损毁;日本武装渔船还在海上抢劫并击伤宝安渔民。^{[18](P165-166)}面对日军的持续袭扰,粤籍民众将香港作为逃难目的地。据香港入境部门统计,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香港人口增长近25万,其中内地粤籍难民占很大比例。^{[19](P136-137)}

1938年9月19日,日军进攻广州。10月13日,日军占领淡水、稔山。“淡水被敌机狂炸两日,投下燃烧弹无数后,竟日焚烧,昨晨仍未熄灭,全部

已成焦土。”^[20]日军10月21日即攻占广州。广州周边的从化、佛山等地也迅速为日军所占领。

尽管10月15日起宝安县已进入战备状态,但仍有大批省内他地难民进入宝安县避难。在太平为日军所占后,大批东莞难民进入宝安,被收容于宝安县城的东莞会馆之中。^[21]受惠阳战事影响,“难民四散,东涌、大鹏、沙鱼涌均有难胞来港暂避”^[20]。至11月10日,东莞、惠阳、博罗等地已有数千难民逃至宝安县聚集。

宝安县是粤港最为直接的通道。随着日军的迫近,大批难民不断经宝安涌向香港。难民入港高峰期间,每天有一二千人乘船到达香港。仅1938年10月,乘船入港者比离港者多16000人。^{[19](P139)}从广州失陷至10月26日,半个月内香港人口即已增加近十万名。^[22]11月11日,宝安县后海湾聚集大量难民等待由水路迁往新界。在前一批自东莞、惠阳的难民往港的同时,下一批难民旋即又进入深圳,每日过境难民不下三四百人。^[23]

1938年11月22日,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并轰炸沙头角,大批民众涌入香港。23日,日军沿广九线逼近粤港边界。^{[24](P207)}26日,日军占领南头、深圳和沙头角,宝安沦陷。^{[25](P14)}约有三万余难民从陆路逃入新界,分别落脚在上水、石涌澳、粉岭、大埔圩一带,多为宝安、惠阳县籍。铁路两旁过境难民触目皆是,情形凄惨。宝安南头亦有一万余人乘船逃至元朗一带。^[26]整个新界人满为患,大埔、八乡、元朗一带村庄涌进不少难民,总计已达三四万人。^{[19](P139)}香港一时人口激增,社会不堪重负,难民赈济问题愈发突出。

由于日军攻占宝安县后越入香港新界,侵犯了英国所属领土,破坏了英日双方将宝安地区划为安全区的约定,引起港英当局抗议。1938年12月1日,日方撤出了侵入宝安县与新界的日军。^[27]12月2日,县长梁宝仁率军收复宝安。^{[25](P14)}家在宝安县的跨境难民纷纷返乡查看情况。但由于日军新退,宝安县形势尚不明朗,出于安全考虑,返乡民众再度返回新界的收容所居住^[27],形成了难民回流后二次过境入港现象。12月12日,宝安县难

①参见吴德文,《宝安人民抗日战争纪事》,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藏,2008: 21.

民逐渐返回宝安居住,但因县城粮食不足,返乡人民甚少。^[28]数万难民仍徘徊滞留于新界一带。

1939年2月下旬以后,宝安县再度受到日军轰炸。2月21日,日机轰炸深圳,深圳难民再次撤入新界内。日方的言而无信再度引发英方抗议。英方强调深圳难民区的存在已获日本允诺,并安排难民再返深圳。^[29]2月26日,日机侵入宝安县,南头居民纷纷乘舟往流浮山避难,到天黑才返回^[30];从陆路躲入新界的难民超过3000人^[31],至3月8日才陆续返回深圳生活^[32]。直到3月中旬,宝安县南头市场及大新街不少商店才恢复营业。^[33]此后,日军还数次对宝安县实施小规模骚扰,每次都会惊动少量难民向新界一侧逃难,俟日军退去后又再度返回深圳收容所。^[34-37]本地居民跨境避难行为特征逐渐由大规模、集中式、单向迁移转变为小规模、多频次、双向往来,表明难民已逐渐适应战时环境下的社会生活。

二、广州等城市沦陷前后县港两地的难民应对措施

面对短期急发的难民潮,县港两地政府和社会团体积极行动,对难民尽力实施救济帮扶。

(一) 宝安方面的主要措施

对于外地流入难民,宝安县政府竭力开展收容工作,积极争取侨港同乡团体支持。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政府牵头扩充收容资源。宝安县政府搭盖临时收容所,以收容邻县过境难民,并在各处征集米粮进行散赈。^[38]自1938年11月7日起,宝安屡遭日机轰炸,导致原有的大小十余所旅店仅剩三五家仍在营业。宝安县政府积极协调房屋资源,先后将宝安县公安局、安乐园等改造为收容所,勉力维持难民收容。^[23]二是主要官员过境香港争取社会支持。鉴于宝安县现有条

件不足以对过境难民实施全面救济,11月7至11日,宝安县县长梁宝仁与南头镇镇长郑勉之等专程前往香港,向香港宝安商会^①等侨港团体请求协助救济难民,双方开会讨论宝安难民状况与赈济事宜。^[39]香港宝安商会随后在香港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②(简称“香港赈联会”)举行的大会上,提请对宝安难民予以救济,并得到了初步赞同。^[38]香港惠阳、东莞商会也多次与香港宝安商会会商惠、莞过境难民救济工作,并派代表前往宝安赈济难民。^[40-41]三是提供难民医疗救护服务。宝安县在深圳镇组建救护队,协助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42]

(二) 香港方面的主要措施

香港方面亦推出一系列举措,一方面由港府组织收容安置,加强对入境难民的赈济;另一方面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竭力应对救济资源不足的问题。主要措施一是全力安置入境难民。1938年8月,港府成立锦田难民营,同时还推动建设北角、京士柏和马头角等难民营,用于收容新界和流入市区的难民。^[43]同年10月以后,港府陆续在港九、新界建成北角、马头涌等十余处难民营,其中以京士柏、北角、马头涌和锦田难民营规模较大,容纳人数均在一二千人以上。^[14]二是制定和实施难民保领与遣返办法。针对入港难民过多的情况,港府准许难民由其在香港的亲友带回家中安置。同时积极实施遣送难民回乡计划,对自愿返回原籍的难民予以资助。至1938年10月25日,新界3100多名难民一度只剩700余人^[44],赈济压力得以缓解。然而,由于滞留宝安的过境难民每天持续以数千人的体量迁往新界^[45],给香港带来的冲击短期仍难消除。

1937年下半年后,香港各界发起建立了一批救亡赈济团体^[46],形成了空前壮大的民间救济力量。民间救济措施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

①香港宝安商会是由在港的宝安籍商人组成的同乡组织。1916年4月前后,在香港政府登记为华人同乡组织“驻港宝安商会”。参见List of Exempted and Registered Societies[J].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916(165): 211. 该会在战前为宝安县的城镇社会建设提供了诸多支持,与宝安县在经济与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密切的往来。

②香港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成立于1938年5月,是香港各界为从事难民筹赈工作而联合成立的社会救济团体。参见香港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关于检送收容难民情形调查表一事的文[Z]. 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38-07-15. 档案号:020-007-58-133;邓家宙. 抗战时期香港救亡赈难团体(1935-1941)介绍[J]. 抗战文化研究,2018(11): 32.

积极募赈钱款物资,为难民提供基本生存救助。活跃在香港社会团体中的中共力量在救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9月,在中共党员的推动下,香港大学学生会成立香港学生赈济会(简称“学赈会”)。学赈会积极引导香港学生在本港发起筹款等活动以救助难民。^[47]紧急救济难民会^①自1938年6月中旬起,每日下午2时半在圣彼得教堂施饭放赈,接济难民。^[48]二是针对难民需求,组织开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活动。1938年11月中旬,紧急难民救济会举办难民学校,为锦田难民营的难童提供基本教育。^[49]12月初,针对元朗难民患病者日多、官立医局和私人医生难以应付的严重情况,中区果业小贩赈灾义卖团决议在元朗设立一赠医施药机构,使难民患者可前往求诊发药。^[50]三是协调各方力量,救济帮扶家乡难民。11月中旬,惠阳、东莞、宝安三县旅港商会负责人数度会商,协调三地联动实施赈济事宜,使救济工作得以顺利进行。^[40]政府实施难民初步收容安置,社团组织跟进开展救济活动,展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粤港难民救济工作的丰富实践面相。

(三) 县港两地的措施互动

为了解宝安县难民的处境、制定有针对性的施赈办法,1938年10月19、20日,香港赈联会经过讨论,决定由东华医院、香港惠阳商会与周艺兴织造厂负责难民施食工作,并由该三个团体和机构派出林培生等代表赴新界与宝安县开展难民数量和入境调查活动。通过在新界的摸查工作,发现内地难民多由沙鱼涌、沙头角、深圳等处进入新界,由此拟定在这三处交通要点设立施粥站,以解过境难民之饥。^[51]11月11日,香港赈联会人员前往宝安县开展实地调查^[39],宝安县政府给予了充分配合。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11月16日,香港赈联会再次召开大会,听取调查组关于宝安县难民的调查报告,议决拨款三千元港币由救济组及香港宝安商会会同救济宝安难民。^[52]

港英当局还尝试推动建立难民安全区和异

地收容场所,意在扩大难民收容能力,争取建立难民救济和军事隔离的缓冲带,最大限度降低难民对香港本土的影响。1938年11月中下旬,港英当局以锦田难民营位额已满为由,与日方协调商议,拟划出宝安县的南头、深圳、沙鱼涌为难民安全区,以便靠近香港之华界居民躲避战乱,同时防止中日双方交战危及第三国境。11月21日,英美代表又前往宝安县与梁宝仁县长磋商,计划在宝安县境内的深圳、沙头等地建立难民收容所。^[27, 45]

三、宝安首陷前后县港两地的难民应对调整与衔接

随着日军侵略的升级,1938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日军首度进占宝安县并大肆烧杀抢掠,之后又于1939年2、3月间持续空袭宝安,导致本地居民及周边难民大规模进入香港以避战乱,迫使县港两地社会对难民救济做出应急调整。

(一) 香港方面的措施调整

面对宝安沦陷后过境难民激增的严峻形势,香港政府、救济机构以及其他社团组织、社会贤达各出其力,以扩展收容场所为中心,从难民的接运、收容、安置、医疗等多个环节着手,对救济措施作出调整。香港紧急救济难民会雇车数十辆,载运难民超过2000人至粉岭收容。因粉岭尚未修建收容所,故港府经与九广路局协调,先后拨出100个货车车厢,在车厢附近搭建竹棚作为厨房,以供难民生活。香港太平绅士罗旭和等除派员搜罗、找借新界各地的空屋及祠堂外,还与轮船公司商借轮船,帮助难民免遭露宿之苦。港府亦决议启用即将完工的北角、京士柏和马头角等难民营,以减轻锦田难民营的压力。此外,香港的元朗商会、宝安商会、华仁书院等社团机构募集大量物资,并派员开展施粥、散赈活动。^[26, 53]1938年12月2日,由中共党员刘谈锋任团长的学赈会第一团由香港开赴宝安

①香港紧急救济难民会1938年6月由本港中西人士合办,由何明华会督任主席,在赈济华南难民方面作出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邓家宙. 抗战时期香港救亡赈难团体(1935-1941)介绍[J]. 抗战文化研究, 2018(11): 35.

县,配合国民党九一三团开展救护、慰问宝安县难民的工作。^[54]1938年12月中旬,在八办的支持下,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等爱国团体代表决定成立以“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12月下旬,东团驻港办事处派出教育队前往位于新田、落马洲、元朗的宝安置难民区服务,为难民讲解救护知识,指导宝安置难民回乡,还在新田和落马洲两处开办了难民学校,收容难童300余人。^①

(二) 跨越县港的措施延展

港府从本港的救济能力和社会利益考量出发,在与宝安县政府协商的基础上,推出难民异地移送安置措施,将安置难民的空间场域延展至宝安县境,借以降低香港的救济压力。1938年12月,香港紧急救济难民会承接了此项工作,利用深圳又生公司旧址建成可收容2万人的“难民临时收容所”,用以救济安置滞留新界的难民。该收容所内难民所需粮食由港方供应,饮用水则由新界派货车运送,并在深圳设立临时医院,由港府派出医生协助开展医疗工作。^[55]12月18日,港英当局与广九路局议定由其派车将滞留在上水的难民运往深圳收容。香港赈联会亦登记各站收容难民情况,并在上水、元朗各设一总站,负责粮食运输、物资储存、医疗救护等工作。^[56]12月24日,港府决定将新界全部难民移往深圳,由紧急救济难民会集中开展救济,并宣称难民将来如再需救助,仍可再来香港。赈联会决定配合港府工作,暂停新界内各站的接收救济工作,劝说难民返回华界,但反对在难民离开新界之前拆除难民收容设施。^[57-58]上水难民近千人率先迁往深圳,赈联会救济组主任林培生率工作人员前往上水,解释港府的行政命令,并由警察指引难民乘车抵达罗湖,再步行进入深圳收容所。而大埔方面难民除少量惠阳籍难民愿返原籍外,大部分难民转往深圳集中收容。^[59]

随着进入深圳的难民数量的增加,香港紧急救济难民会决定扩建设在深圳的难民收容

所,并商定由赈联会予以协助。赈联会救济组主任林培生亲赴深圳调查收容所状况,认为其基本布局已甚为完善,决定补充修建床位,并将深圳戏院、酒楼、又生公司职员宿舍等场所扩为收容所投入使用^[60],使其容量达到15000人以上,以便接纳新界的全部难民。1938年12月27日,中央救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赴深圳等地视察新界难民转移安置情况,充分肯定了深圳难民收容所的管理秩序、医务工作和转移安置成绩。12月30日,紧急救济难民会将深圳难民收容所移交给赈联会管理,由其对深圳收容区难民进行统一救济。此时,新田难民已全部进入深圳,文锦渡难民也开始往深圳转移,元朗、粉岭等地的迁移亦在筹备当中。深圳难民收容所还在中英交界河段设浮桥两座,以满足难民来往之需。赈联会还在深圳难民收容所设立难民工艺所、难民学校等机构,传授生产技能^[61],鼓励以工代赈;在新界率先开展难童教育与难民垦殖工作,在粉岭、义坑已设立两所难童学校,特聘中山大学陈燦明为义务校董,收容难童180人入学;在锦田难民营推动难民垦殖工作,在岭南大学教职员的协助下购办了肥料、菜种,组织难民利用私人荒地种植,以期获得农业收成。^[62]

1939年1月3日,香港的难民转移收容工作进入尾声,仅剩元朗、落马洲、粉岭、坪山四处难民未完全疏散。1月4日,港府下令新界停办赈务,难民须前往华界深圳收容所。^[63]1月13日,赈联会完成将新界全部难民迁入深圳的工作。深圳难民收容所采取男女分居的管理办法,内部秩序良好;居住区光线充足,空气畅通,提供了草席、棉被、棉衣等生活用品,难民两人同睡一床;饭堂、病房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水电供给正常,设施已日渐完备^[64],甚至还吸引了一些粉岭居民和广九铁路员工陆续前往接受救济。^[65-66]

(三) 宝安方面的措施对接

与港方难民转移收容措施相对应,宝安县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对接措施,协同港方迁移收容措施,共同推进难民救济与善后工作。主要

①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1985:24,54。

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组建难民善后工作委员会,统筹全县灾民赈济及秩序恢复等工作。1939年1月29日,县长梁宝仁主持召开难民善后工作会议,决定由本县各区乡长绅耆共同组成善后委员会,协同香港赈联会开展善后工作。赈联会受邀派出救济组林培生为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67]二是牵头成立县救济难民委员会,负责向侨商各界筹募赈济款项。1月31日,宝安县成立以县长为主任委员的救济难民委员会,委员会由宝安县党部、县政府、香港赈联会等部门、机构组成,赈款来源于省府、行政专员与侨商^[68],反映了宝安县与香港社团在救济难民工作中的互动合作。三是创建深圳农村福利会,支持难民垦殖自救。1939年2月初,宝安县在深圳镇成立农村福利会,以帮助农业难民回归务农。此举得到了国民政府和香港各界的支持。中央振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①和主教华托他、东莞商会主席周俊年及太平绅士周寿臣、罗旭和等悉数位列福利会名誉会长名录之中^[69],显示了该组织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2月8日,该福利会举行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主席陈丕士、副主席林铭勳等委员。^[70]陈丕士认为与其让难民在赈济中苟活,不如为其创造工作机会。陈丕士通过调查发现,自宝安县沦陷后的三个月内,该县大部分田地处于未犁状态,农业生产陷于停顿之中。陈主张向难民传授农业、卫生知识,供给谷种、菜种、肥田料、农具及耕牛等生产资料,组织开展农业改良实验,争取将其培养成专业的农业生产人员及初级卫生救护人员等。为此,福利会先后从香港和广东省招募主修农科、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在蔡屋围开办学校训练难民。福利会还得到岭南大学农科教授林理察及其学生的协助,开辟了从海外引进生产工具和种子的渠道。^[71]陈力图通过这些方法,使坐等救济的难民自耕自养。

四、难民境遇与救济状况的变化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宝安县在中日战略相持的争夺之下几易其手。1939年8月中旬和1940年6月下旬,日军又先后两次进占宝安,由此引发了当地民众频繁过港避难的风潮。相对于宝安首次沦陷前后的情形而言,宝安民众后续的生活境遇以及两地救济活动的实施状况均有所变化。

(一)宝安县再度沦陷之下难民的艰难境遇

1939年8月13日,日军从虎门出发,于8月15日深夜再陷宝安。^[72]日军进占南头时,先行破坏了南头至深圳的电话线,以致日军进入深圳之后宝安民众才发觉,并在十分慌乱的情状下由文锦渡向英界逃避,情状甚为狼狈。更有数十日兵尾随追击,数架日机在上空低飞扫射,“当堂被击倒数十人,鲜血涂地,时呼天抢地之声,更属凄惨”。港英当局因提前接得敌方通碟,派出警察在边境罗湖桥、文锦渡一带警戒并维持秩序^[73],协助深圳当局保护百余名难民迁入英界。^[74]8月17日,沙头角华界居民已全部撤离。设于深圳又生公司的难民收容所千余人,再度移入英界义坑。^[75]

8月20日,日军在边境增设岗哨,严禁宝安乡民进入英界。英方亦派英印军队驻防边境,边境局势持续紧张。^[76]因陆上边境山峦重叠、道路甚多,防不胜防,平湖、常平等地的乡民仍可通过香港大埔至沙鱼涌一线过港避难。^[77-78]深圳墟内未及撤走的商民则从宝安县黄贝岭村一带偷渡至英界文锦渡、新屋岭村,但其中大部分人只能在新屋岭原有难民营附近的山坡前露宿,或在临时搭成的简陋草棚中度日。^[79]

8月27日,边境形势有所缓和,每日往返华界与英界的民众有所增多,但限制措施仍十分严厉。由于日军尚未实施良民证管理,故对过境民众严加盘查。^[80]8月30日,日军将海陆封锁线

①何明华,英国人,香港圣公会第七任会督,对抗战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学界对何明华在抗战期间的广东社会救济研究集中于中山与增城一带,尚未见有何明华救济宝安县难民的情况和影响研究。参见吴青:《何明华与中国关系之研究(1922-1966)》[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较前延长两倍之多,以扩大对港封锁。^[81]日军还规定宝安往港乡民或携带家眷回乡者,每人须缴出国币三十元,方可通过边境。^[82]因驻扎在南头的日军对人员货物出口加以限制,故香港宝安小轮抵达南头后不敢泊岸,只能在英领海内下碇,由乘客自动乘小艇离船上岸。^[83]9月10日,日机向经沙鱼涌一线避难难民扫射,当场击伤十余人,并造成人员互相践踏、坠入山谷。^[84]9月13日,占据宝安县的日伪组织宣布,不领后备证及良民证的乡民,禁止出入南头县城,导致进入新界避难的宝安人民不敢返乡。^[85]

(二) 县港两地救济活动的实施变化

到9月下旬,由于日军的施暴和封锁,仍约有两万余名乡民逃入香港的元朗、上水、落马洲等地,流离失所,几成饿殍。^[86]10月14日,深圳难民选派代表与香港救济团体接洽,呼吁社会各界施以救济。^[87]10月17日,香港赈联会举行联席大会,东华医院、东安港侨救难会、沙头角联合救难会共同提请救济新界难民。赈联会向紧急救济难民会请求拨款救济新界难民,并先行拨捐白米一百六十包,分交东安港侨救济难民会、四妇女会和沙头角街坊联合会等前往新界施赈。^[88]但由于跨境难民落脚分散,给难民管理与集中散赈带来了极大困难。为解决这些问题,东华医院主席周兆五约同东莞、宝安商会主席周俊年、陈鉴坡,谒见华民政务司那鲁麟,请示如何救济。^[89]此外,香港五大妇女团体亦联合行动,拟在新界附近成立一施赈办事处,每日不间断开展救济活动,并先行购办大批赈品运入新界散赈,以解燃眉之急。^[90]而流浮山一带的难民则由港府分别移送新界各难民营或就地重新盖搭棚屋予以安置。^[91]

相较于宝安县初次沦陷前后的救济工作,香港方面此时的救济活动却表现出一定的被动与消极。一是难民营未能全面恢复启用。新设难民寮屋地处偏野,坟墓环绕,每间占地不到40英尺,卫生条件恶劣。紧急救济难民会医药总监司徒永觉计划在落马洲、採樵岭、打鼓岭新建三处难民营予以救济,^[92]但因政府决策

效率低下,以致工程进展缓慢。二是社会团体的救济活动覆盖不足,难以改变难民的生活窘困。始终有难民无法获得赈济,不少难民只能自谋活路。至11月中旬,难民生活已近绝境,不少人被迫向新界居民乞讨或为其做劳役以获取钱粮,亦有人冒险返乡或违例进入港岛打工。三是部分群体对现行难民赈济方法有所质疑,主张难民应参与垦荒,以增加生产、支援抗战。^[93]

救济工作所暴露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改良呼声,倒逼县港两地采取更为有效的救济措施。1940年1月3日,中央救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杜月笙、王晓籁派专员赴宝安县灾区考察,并探访了一些返乡难民。返乡难民表示即使房屋被毁,只要田园尚在,就能荒芜化阡陌,只是苦于缺乏生活必需品。中央救济委员会针对返乡难民的需要,将救济分为治标、治本两部分,治标即发放衣物、药品等物资,治本为办理春耕^[94],为返乡难民提供谋生出路,使其得以自力更生。广东省振济会也主张在救济之中推动农民复业,通过难民移垦开发地利。^[95]宝安县政府方面很快予以响应,1月6日,新任县长幸耀燊主持召开善后会议,决定设立难民招待所,供无家可归的难民栖身;组织县赈济会,编组难民以工代赈。^[96]幸县长还亲赴香港,向香港宝安商会主席陈鉴坡等通报本县难民善后及救济计划^[97],请求侨港绅商协助购买耕牛、种籽及给养,所需费用从相关赈款中支付,得到了宝安商会方面的赞同与帮助。^[98]

1940年1月12日,为解决难民长期滞留新界、社会资源难以为继的难题,港府管理难民事务负责人约同宝安县政府官员在新界举行会谈,协商留港难民遣送回乡办法,新界理民府和香港紧急救济难民会、宝安商会等均派代表出席了会谈。会中,县港政府就难民遣返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对有家可归者,予以资送还家;无家可归者,则由宝安县政府施行工赈救济。^[99]1月24日,幸耀燊县长召集宝安各界团体讨论接收遣送难民回乡耕种的具体办法,香港宝安商会亦派会员蔡宝田等回乡出席会议。会议初定通

过“以农代赈”的办法解决难民遣返安置问题：议筹借田地安置难民种菜，收成运港换粮；蔡宝田捐私田二百亩，县府借两区田地三百亩开荒；种菜难民一次性领十元国币、二十磅米（孩童减半），种籽耕牛由慈善团体捐助；无力耕作难民发放一月口粮遣返原籍。^[100]不久后，宝安县赈济委员会议定协助香港遣送义民回籍办法，主张派员先行掌握新界难民个人情况，待难民抵达县境后，按照一定标准散发赈款，由救护队送其回家，并在旅途中提供必要的招待与休息场所；对无家可归者暂予临时收容，并需参与以工代赈投入生产。^[101]在接运回籍难民方面，宝安县政府确定以每期五百人为限，分期接运并加以安置。幸县长还专程赴港与何明华会督就回籍难民发放定额粮食事项进行沟通并达成共识。^[102]

1940年2月5日，遣送难民回籍与组织难民垦殖工作同步启动。“其有家可归者，于领到米与银后，即行回家复业。其无家可归者，则暂留深圳居住，由政府指导耕种，以工代赈”^[103]。幸县长亲率县府全体职员及中华战地救护队等，在广九铁路深圳大站迎接回籍难民，登记发放证件、旅费与白米。当日由港遣送回宝安县者，有新屋岭、锦田等营难民二百七十余人，其中多系深圳、黄贝岭、蔡屋围、布吉等乡人民，经发给白米与钱款后，即返家居住。^[104]深圳农村福利会提前购备生产资料，以助返乡农民投入农耕。幸县长在深圳设一难民农场，由县府赠给难民一月米粮，以助难民从事垦殖。^[105]宝安商会蔡宝田又借田五十亩，期限一年，免租借与义民种菜。^[103]

1940年2月24日，第二批滞留新界的难民开始返乡。县政府划定五百亩地专供无田难民春耕。在岭南大学教授陈少儒等人的指导下，村民专注耕耘，充满生产气象。^[106]宝安县难民赈济会积极推动春耕，拨款一万元购买谷种，分发各处贫农。^[107]对于一万余留港宝安难民，广东省政府按照战区县份补助办法办理，指定由广东省银行给予农贷救济。^[108]赈联会和宝安商会等团体也陆续携米前往散赈。^[109]何明华会督除发放米粮赈款外，还派人前往深圳协助发展农村

春耕工作^[110]；至当年6月，深圳难民农场已有大批菜蔬出产并运港发售。^[111]

（三）县港难民境遇与救济活动的后续变化

1940年6月22日，日本第三次攻陷宝安县。逃入英界的难民超过5000人，不过秩序尚好。^[112]据东华医院的调查报告称：文锦渡一处即有难民棚7座、厨房及医生棚各1座、饭棚1座，难民皆席地而睡……计共有难民1269名，每人每日仅得冬瓜梅菜粥一大碗充饥，俱由政府供给。^{[113] (P104)}难民多已具备逃难经验，除赴难民营收容者外，其余难民或纷纷搭建小寮，或投奔亲友。只是宝安县与香港合作的“以农代赈”再遭破坏。

“新界有逃来一老农对人泣诉，谓其在圳领得一幅小地，与其年仅九岁男孙，合作耕耘，田中作物，已届成熟，不料现竟作为日人马粮。多月之血汗，化作徒劳。”^[114]

由于日军长期占领宝安，运往香港的生活物资日益紧张。^[115]港府无力维持救济工作，遂与日方接洽，协商准许难民自当年7月1日起凭港府发给的特别通行证回乡^[116]，以便对难民进行遣返。7月1日，新界警察分别在罗湖、文锦渡、沙头角三处发放难民回籍通行证，约有500人前往领取，多为东莞、宝安籍。^[117]但难民一进入华界，即遭日军拘留^[118]，须经一番刁难后方可通过，甚至有不容东莞籍难民过关和不许持证人员通过的情况。同时，由于日军并未彻底封锁老鼠岭—黄贝岭和流浮山一线，此两处难民不领通行证亦可返乡。^[119]加之有难民反映返回宝安的难民多被拘为筑路伏役，因此仅有极少数难民领取通行证回乡。^[120]

在此艰难形势下，粤港社会仍就难民救济作出努力。广东省振济会驻港办事处主任叶兰泉等赴中英边界，视察难民情况；港澳振济会、崇正总会等团体亦派员调查难民情况。^[112]香港宝安商会发起急赈会议，联合钟声慈善社和东华医院调查难民情况，并会同崇正总会、香港东莞商会等团体前往新界施粥散赈；妇女兵灾筹赈会也派员前往打鼓岭一带村落，分派米、面包、牛奶及万金油等物资救济难民。^[116]1940

年7月期间,赈联会举行大会,决定先行拨助白米五十包交宝安商会和崇正总会联合救济^[119];中央振济委员会第九救济区拨急赈款国币三千元及振衣五千件、奎宁五百粒、痧水五百瓶,统交宝安商会实施救济。^[121]宝安县县长幸耀桑亦奉省府主席李汉魂之命携款赴新界散赈,并会同陈鉴坡往边界各地抚慰难民。^[122]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亦为深圳难民提供搭棚、棉衣和赈款港币3023.6元。^{[123](P757)}虽然社会各界对在港难民给予一定救济,但远不能使其摆脱背井离乡的窘困。

1940年,中共引领的香港学賑会的领导权为国民党所夺,学賑会转变为国民党从事反共活动的工具,失去了赈济难民的功能。^[47]在国民党的迫害下,东团于1940年被迫解散,停止了对宝安县的难民救济工作。^①

直至抗战胜利,宝安县一直处于各方反复争夺的态势之下,县港两地的难民救济难以持续进行。1941年12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天后香港完全沦陷。区域性难民问题再次突显,只是此时难民主体已转变为内迁避战的香港居民。在民族危难之际,难民群体的苦难命运终是未能改变。

五、结语

全面抗战初期,宝安和香港两地社会面对区域性难民问题,既是独立的应对主体,又是互为缓冲的利益相关方。县港通过互动协作,一度实现了区域间难民救济的有效接续,使域内难民救济控制在可承载的状态之下。然而,随着日军数度占领宝安、武力封锁边境以及对港迫近压制,县港两地对难民的后续救济渐显乏力,难民终究无法获得安定的生存环境。

难民在边境的聚合与流转,尤其是在宝安数度沦陷时所呈现的“日军至则入新界、日军撤则返宝安”独特现象,在抗战时期全国各区域难民活动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水暂分华夏界,危桥不少过来人”^[124],战火和管制终究无法阻

断两地人民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宝安与香港在难民应对中的互动与协作,展现了两地人民直面危难的勇气和作为,也折射出两地社会在人道救助、乡土情感、民族大义与战争威胁、秩序维护、生存压力中的不同考量与取舍。

对1937—1940年粤港特别是县港两地难民应对与救济活动的考察,既是抗战时期跨区域难民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独特个案。通过分析县港两地在区域性难民救济问题上的举措,有助于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内地与香港社会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互动历程,并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协作、区域性危机应对和一体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万振凡,何金华.两难的困境:抗战时期的难民回流问题(1938—1940)[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2):41-52,141.
- [2]王龙.全国抗战时期日军空袭兰州中的难民救济(1937-1943)[J].军事历史研究,2022(5):31-39.
- [3]李禹阶,刘寿堂.抗战时期的难民垦殖与民族教育——以西康学生营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1):80-86.
- [4]孙艳魁.抗战时期难民人口伤亡刍议[J].民国档案,2012(3):121-129.
- [5]谷秀清,彭雷霆.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综述[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1):99-104.
- [6]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J].抗日战争研究,2004(3):201-220.
- [7]杨雅丽.个体与国家:南京大屠杀前后难民的民族情感探微[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4):25-38,140-141.
- [8]朱天乐,朱成山.南京安全区难民生存的真相——兼论南京难民经历“法益侵害”和“人道救援”的双重际遇[J].民国档案,2020(4):119-128.
- [9]孙宅巍.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收容所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7(5):224-231.
- [10]张生.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69-174,192.
- [11]延会霞.香港中国新闻记者公会慈善活动研究

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1985:

- (1938-1941)[D]. 开封: 河南大学, 2023.
- [12]房正宏. 香港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历史贡献及启示[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3): 129-133.
- [13]秦洪芳. 香港沦陷前难民境况和港英政策[J].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5): 33-36.
- [14]张丽.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J]. 抗日战争研究, 1994(4): 132-141.
- [15]陈达. 现代中国人口[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 [16]邓开颂, 陆晓敏. 粤港澳近代关系史[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17]敌舰袭赤湾之港讯企图派水兵在宝安登陆被当地保安队予以迎击[N]. 香港工商晚报, 1937-09-06(1).
- [18]关于日军袭扰宝安的电文(六则)1938年2月——1938年5月[M]//深圳市史志办. 民国时期深圳历史资料选编.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4.
- [19]余绳武, 刘蜀永. 二十世纪的香港[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 [20]我军奋勇抗战白茫花昨激战甚烈我军坚守淡水之北阵线×昨图在宝安登陆未逞[N]. 香港大公报, 1938-10-15(3).
- [21]宝安现状谈宝港交通现尚通畅太平之×企图来犯[N]. 香港大公报, 1938-11-08(5).
- [22]港中侨胞表示一致竭诚拥护中央政府[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0-26(4).
- [23]宝安视察记[N]. 香港大公报, 1938-11-14(3).
- [24]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宝安历史纪事[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 [25]深圳市宝安区史志办. 宝安大事记[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3.
- [26]宝安县形势危殆深圳陷落难民纷逃英界县城被围孤军尚在死拼[N]. 香港大公报, 1938-11-27(5).
- [27]宝安深圳划难民区已得×司令宫琦承认经相当手续后可宣布[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2-07(2).
- [28]宝安县长梁宝仁返南头[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2-12(4).
- [29]港当局向日交涉保证难民区安全[N]. 香港大公报, 1939-02-25(6).
- [30]宝安局面仍紧张南头深圳人口已疏散[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2-26(5).
- [31]深圳被炸后本港难民增加[N]. 香港大公报, 1939-03-02(6).
- [32]我军增防东宝边境广九路沿线各乡之安谧[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3-09(5).
- [33]宝安安谧多日南头等已恢复原状[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3-13(6).
- [34]×昨犯宝安已击退南头城又被×放火[N]. 香港大公报, 1939-04-12(5).
- [35]新界难民昨迁返深圳[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4-18(7).
- [36]南头之×已被我击退宝安小轮照常来往[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5-12(7).
- [37]粉岭难民迁回深圳[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5-14(8).
- [38]赈联会调查组明日出发宝安调查难民[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1-10(4).
- [39]宝安县县长来港商救济难民[N]. 香港大公报, 1938-11-08(6).
- [40]惠阳东莞宝安三县旅港商会联商救济难民[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1-18(4).
- [41]宝惠东增四邑商会派员前往宝安散赈[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1-21(4).
- [42]宝安成立救护队[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1-19(2).
- [43]Establishment of camps for alien refugees and others[J].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938(843): 812.
- [44]锦田难民营留居难民仅数百人[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0-26(4).
- [45]英美提议划深圳南头为安全区[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1-24(2).
- [46]邓家宙. 抗战时期香港救亡赈难团体(1935—1941)介绍[J]. 抗战文化研究, 2018(11): 23-44.
- [47]罗文捷, 吴青. 抗战时期香港学生赈济会发展研究[J]. 民国档案, 2025(1): 70-82.
- [48]紧急救济难民会实行放饭施赈[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06-14(4).
- [49]紧急难民救济会拟举办难民学校[N]. 香港大公报, 1938-11-04(6).
- [50]紧急难民救济会将在华界设立难民营[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2-05(4).
- [51]深圳大埔沙头角今日开始施粥林培生等昨赴新界调查布置[N]. 香港大公报, 1938-10-21(6).
- [52]赈联会昨开大会广州难民救济加紧进行拨三千元接济宝安难胞[N]. 香港大公报, 1938-11-16(6).
- [53]难民漫山遍野情状极惨[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1-28(4).
- [54]宝安参战经过转战平湖各地出生入死全团无恙归来将再出发[N]. 申报, 1938-12-02(4).
- [55]深圳又生公司难民收容所今日开放[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2-13(4).
- [56]上水居留难民迁往深圳收容[N]. 香港大公报, 1938-12-18(6).
- [57]当局迁新界难民集中深圳救济[N]. 香港大公报, 1938-12-24(6).
- [58]宝安秩序已复新界难民全部移返华界[N]. 香港

- 工商晚报, 1938-12-24(4).
- [59] 上水大埔两区难民昨已实行移送深圳[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2-25(4).
- [60] 深圳收容所积极扩大布置[N]. 香港大公报, 1938-12-27(6).
- [61] 振委会许代委长赴深圳宣慰难胞[N]. 香港大公报, 1938-12-28(6).
- [62] 各界赈联会明晨接管深圳难民所[N]. 香港工商晚报, 1938-12-29(4).
- [63] 新界难民万余人迁移工作将告毕[N]. 香港大公报, 1939-01-05(6).
- [64] 深圳难民收容所布置日臻完备[N]. 香港大公报, 1939-01-13(6).
- [65] 粉岭难民亦迁深圳[N]. 香港大公报, 1939-01-23(6).
- [66] 深圳难民所救济铁路员工[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1-25(4).
- [67] 宝安今日开善后会议[N]. 香港工商晚报, 1939-01-29(4).
- [68] 宝安县近况[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1-31(6).
- [69] 深圳农村福利会名誉会长芳名[Z].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 1939-2. 档案号: 4-A1-122-2.
- [70] 深圳农村福利会协助农民授以防空知识[N]. 香港大公报, 1939-03-01(6).
- [71] 深圳农村福利会组成人员及工作计划等[Z].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 1939-2. 档案号: 4-A1-122-3.
- [72] 一周大事记[N]. 星岛周报(香港), 1939-08-27(12).
- [73] 再犯宝安占深圳陷南头[N]. 香港天光报, 1939-08-17(2).
- [74] ×今晨陆空犯宝安深圳南头再度沦陷[N]. 香港工商晚报, 1939-08-16(1).
- [75] 沙头角昨晚沦陷[N]. 香港大公报, 1939-08-18(5).
- [76] ×图封锁香港禁宝安乡民逃入英界[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8-22(7).
- [77] 出击获胜我保安队收复横沥[N]. 香港天光报, 1939-08-23(2).
- [78] 宝安×调动极忙港边势紧[N]. 香港天光报, 1939-08-24(2).
- [79] 深圳河沿岸中英边境视察记[N]. 香港工商日报, 1939-08-26(6).
- [80] 鲨鱼涌葵涌×转窥淡水我大军南下阻×深进[N]. 香港工商晚报, 1939-08-28(2).
- [81] 深圳之×并未撤退更扩大封锁本港计划[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8-31(7).
- [82] ×军昨同大亚湾登陆并宣布封锁我边界交通[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8-31(5).
- [83] 南头之×阻止客货出口[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9-04(8).
- [84] 宝安敌寇在布龙公路布防死守[N]. 香港工商日报, 1939-09-11(7).
- [85] 侵宝安之×最新动态[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09-13(5).
- [86] 刘楠楠. 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史料一组[J]. 民国档案, 2020(1): 25-36.
- [87] 深圳难民呼吁救济昨派出代表来港接洽[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10-15(7).
- [88] 宝安再陷后新界难民有万人[N]. 香港大公报, 1939-10-18(6).
- [89] 新界难胞饥寒待毙[N]. 香港工商日报, 1939-10-20(6).
- [90] 五妇女团体赈济新界难民[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10-22(7).
- [91] 流浮山难民处置办法[N]. 香港大公报, 1939-10-30(6).
- [92] 港政府增设集中营收容深圳河沿岸难民[N]. 香港华字日报, 1939-11-12(8).
- [93] 昭宁. 怎样救济难民[J]. 崇正总会救济难民会特刊, 1940: 85-86.
- [94] 三千乡民昨近深圳中振会派员往救济[N]. 香港大公报, 1940-01-04(6).
- [95] 广东省振济会救济义民计划纲要工作报告及有关文书[Z].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9-7~11. 社会部档案, 档案号: 2351.
- [96] 各业相继开市深圳渐复繁荣[N]. 香港大公报, 1940-01-07(5).
- [97] 散处新界我难胞拟遣送回里[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1-13(7).
- [98] 宝安善后之要点[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1-12(5).
- [99] 本港与宝安当局商讨难民回乡办法[N]. 香港大公报, 1940-01-13(6).
- [100] 宝安各界昨开会遣送难民回乡各项办法[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1-25(5).
- [101] 宝安赈委员会定协助遣送义民回籍办法[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1-28(5).
- [102] 宝安各界加紧救济难民[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2-02(5).
- [103] 宝安留港义民由今日起运送回籍[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2-05(5).
- [104] 宝安难民昨遣回乡续详[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2-06(5).
- [105] 宝安县县长决在深圳辟难民农场[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2-01(7).
- [106] 宝安充满生产气象难民纷纷回乡开耕[N]. 香

港华字日报, 1940-02-19(7).

[107] 宝安第二批回籍义民决由赈济会给川资[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3-09(5).

[108] 粤北战区积极复兴中省府救济留港宝安难民[N]. 香港大公报, 1940-02-28(3).

[109] 宝安邑侨救济桑梓[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3-28(7).

[110] 谣传日军再犯宝安不确幸县长之辟谣谈话[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3-10(5).

[111] 宝安人民联请税局解释查禁肥料入口原因[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6-21(5).

[112] 难民数千逃集新界各赈济会办理急赈[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6-25(7).

[113] 李东海. 香港东华三院125年史略[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114] 日机追炸宝安难民[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6-24(8).

[115] 国内大事: 广东我军猛攻江门[N]. 田家半月报, 1939-09-01(4).

[116] 三团体派员调查新界难民[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6-27(7).

[117] 宝安反攻军事我军已布置就绪[N]. 香港大公报, 1940-07-02(5).

[118] 溃退深圳之日伪军连日强迫乡民修筑各路[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7-02(5).

[119] 新界三大站积极办理疏散难民工作[N]. 香港工商日报, 1940-07-03(5).

[120] 深圳难民谈脱险来港经过[N]. 香港工商日报, 1940-07-05(5).

[121] 中振会拨款救济新界难民[N]. 香港大公报, 1940-07-20(6).

[122] 宝安县县长奉命来港散赈新界难胞[N]. 香港华字日报, 1940-07-24(7).

[123] 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宝安县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124] 深圳[J]. 民族诗坛, 1940(5): 32.

【责任编辑 刘婉华】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 Dealing with Refuge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ationwid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Focusing on Bao'an and Hong Kong

LUO Wenjie

Abstract: From 1937 to 1940,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continued to escalate. Large tracts of land in East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South China also suffered continuous invasion by the Japanese army. To escape the war,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moved south to the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regions. With the fall of Guangzhou and Bao'an County, a large-scale, multi-wave "refugee wave" of regional aggregation and transit through Hong Kong was formed, which then triggered regional refugee relief issues in the societies of Bao'an and Hong Kong. The societies of Bao'an and Hong Kong provided rescue efforts independently and interactively.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helter and resettlement, mobilizing social assistance, raising and distributing relief supplies, organizing return migration, and encouraging and helping self-rescue through reclamation, they provided active and effective relief to the refugees and achieved effective continuation and extension of refugee relief activities between regions. It also shows the diverse roles and rich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var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from all sectors in refugee response and relief work. However, as the Japanese army occupied Bao'an several times in the subsequent period, blocked the border by force and pressured Hong Kong from close range, the refugee relief work in the two places became increasingly passive and weak, and the refugees ultimately found it difficult to obtain a peaceful living environmen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gional refugee relief practices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mainly Bao'an County and Hong Kong)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helps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societies in sharing weal and woe and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together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mong cities in the region, responding to potential crises and challenges, and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ationwid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refugee relief; regional refugee issues; Bao'an and Hong Kong;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